

回归文化丛书

三教文化古今谈

(上)

回归文化编辑组

光大出版社

回归文化丛书之

三教文化古今谈
(上)

回归文化编辑组

光大出版社

回歸文化叢書編輯委員會

主 編：張戡坤

副 主 編：李翠紅

本書編委：張戡坤 李 芳 毛小亞 蔡愛武

王 峰 朱 藝 張秀雲

資料編輯：李 芳

回歸文化叢書之

三教文化古今談

出 版 者：光大出版社有限公司

Sunbright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

香港上環文咸西街18號

盤谷銀行大廈15樓1501室

Unit 1501 15/F., Bangkok Bank Building,

No. 18 Bonham Strand West, Sheung Wan, Hong Kong

Tel: +852 2127 7918

Fax: +852 2186 8413

承 印 者：陝西省岐山彩印廠

開 本：880×1230 1/32

印 張：13.5

字 數：376千字

版 次：2007年8月第1版

印 次：200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 數：2000

書 號：ISBN 978-988-99738-4-1

版權不限 贈閱交流



孔
子

略说三教文化的融合

——兼论传统文化与未来(代序)

张其成

一、三教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回顾

儒、释、道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精神财富，是人类对主客体认识的知识结晶。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，以及现代、未来的文明人

类的前途，都与儒、释、道传统文化密切相关。继承、研究、融合、发展儒、释、道的传统文化，是对人类文明的承前启后。

儒、释、道的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都先后宗教化了，由儒、释、道各自的学说、哲理演变成一种宗教理论，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的儒、释、道三教。我们在谈儒、释、道文化时，必然与儒、释、道三教相联系，由于这种文化的宗教化长达千百年的历史，现今我们谈其文化时，无法从其宗教学说中割裂开来。所以，历史上都习惯地称为三教文化。事实上把任何一种学说和哲理绝对化，把其操作实践形式化，那么这种学说和哲理最终就会宗教化。我们现在讲的宗教含意和古代称的儒、释、道三教并不完全相同。宗教一词来自佛教，佛教中以释迦牟尼所说的内容为教，以其弟子所说的内容为宗。教大于宗，教是主干，宗是教的分派和分枝，合起来就称为宗教。所以，佛教所称的宗教，是指佛教的学说和理论。我们现在用的“宗教”概念来自西方文化的名词，英文中“宗教”一词为“religion”，“religion”的意义远比佛教称谓的宗教内涵广泛得多。“religion”是指相信和崇拜超自然上帝的存在，相信人的灵魂不灭并受上帝的支配。

中国历史上所称的儒、释、道三教和“religion”是不相同的，它主要是指儒、释、道的学说理论体系，名为教，实为家。按“religion”的词意，儒、释、道三家称为宗教是不完全对应的。但以其社会功用来看，把三家称为三教也未尝不可。正如任继愈在论证儒教是宗教时所提出的：“我认为宗教不是一个模式。有的宗教以创世的说法表达上帝的存在，如基督教、犹太教，这只是许多宗教中的一种，并非所有的宗教都宣传上帝创造世界。佛教不讲上帝创世说，认为世界是由四大构成的，但没有任何理由说佛教不是宗教。……所以，用基督教的模式作为衡量一切宗教的标准，在方法上不科学；这就像以西方人的身高、肤色作为‘人’的标准一样。看一种宗教是否成其为宗教，应当从其内在

的因素，即从本质上考察。……中国的宗教表现的形式较细致，不那么粗糙简单。……儒教就是在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中产生的一种宗教。”由于中国宗教的特点，中国历史上所称的三教和王重阳主张的三教合一，都要从学说哲理上来理解，而不能只从宗教的形式上去讲究。

三教文化产生于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文化背景，三教文化的差异与三教文化创始人的学说传承、认识方法、适用对象、目的追求不同而密切相关。所以，形成了三教不同的文化体系。由于它的不同和差异，三教文化在其融合中经历了不可避免的冲突、曲折和情感折磨。这种磨合过程中，各家都以自己的理论、认识 and 习惯为其标准，用来衡量并责求对方之理论、认识 and 习惯，这样不免造成各说各优，各称各强，甚至互相吹毛求疵，以致达到互相戕害的程度。儒道二家根植于中土，从创立到汉唐，并没有本质的冲突，实际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儒道二家与佛家之间。

从西汉到西晋，佛教文化大量传入中国，道家衍变成名符其实的道教。这一时期三教各自完善其体系，三家还处于互不熟悉的认识阶段，这一阶段儒家处于独尊的主导地位。东晋南北朝时期，佛教站住了脚根并得到发展，道教也完成了整顿和发展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，从而打破了儒家的主导地位，形成了三教鼎立之势。历史上三教冲突的一切特征在这一时期就基本显露无遗了。儒道从华夏民族的心理习惯、文化传承、政治制度等方面来反对佛教，佛教则从这些方面争辩之。就在这种拼击与争辩中，既显示了冲突，又开始了融合。儒道认为佛教违背传统的纲常伦理，从“捐六亲”、“舍礼义”、“蔑帝王”上攻击佛教，认为佛教无忠、无孝、无仁、无义，如果佛教流行将会对自身、对家庭、对国家都极为不利，甚至认为有“入国而破国，入家而破家，入身而破身”的危险。佛教则认为：“孔以致孝为首，则仁被四海，释以大慈为务，则化周五道。”佛教则以慈、悲、喜、

舍的精神来囊括忠、孝、仁、义之说，认为佛法与儒道之说并行不悖，殊途同归。佛教认为守戒修炼，六度万行，则“道洽六亲，泽流天下，虽不处王侯之位，亦已协契奥极，在宥生民”。

儒道以夷夏说，认为佛教是外夷之学说，夷夏有别，不适合于华夏。认为华夏之人“禀气清和，合仁抱义，故孔明性习之教；外域之徒，禀性刚强，贪欲忿戾，故释氏严五戒之科”。佛教则以“丘欲居夷，聃适西戎，道之所在，宁选于地”来争辩。另外，在理论上还有白黑论和神灭与神不灭之争。佛教也攻击儒道二家，认为“孔老设教，法天以制，不敢违天，诸佛说教，诸天奉行，不敢违佛。”其旨在贬低对方，抬高自己。认为儒道的学说“止是世间之善法，不能革凡成圣”，佛教则是出世成圣之妙法。这一时期，理论的争辩是主要的冲突形式，但也发生过行政干预的事件。北魏太武帝信道斥佛，下诏毁寺坑僧；北周武帝敌视佛教，行政干预，强制灭佛。不过也有发生过打击道教的事件，魏孝明帝时，就发生过打击道教，体罚道士的事件；梁武帝也下过《舍事道法诏》，要求百官宗族舍道入佛；北齐高祖也下过《废道法诏》。回顾历史，儒、释、道之间的斗争冲突，既是憾事，又是融合的必然。在互争互斗中，各家都深研对方的学说和哲理，虽然出发点是找攻击的理论根据，但客观形成了一批精通儒、释、道文化的学者，他们以不同的学说理论互相丰富、完善和渗透，为文化的大融合奠定了基础，为儒、释、道的合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。

儒、释、道文化经历了必要的冲突和痛苦之后，从互相的排斥斗争，过渡到互相的吸收融合。在斗争的过程中有识之士开始思虑各家分歧的颠末原委，于是产生了三教调合论。东晋的慧远，北周的道安，都认为以佛为内，以儒为外。慧远曰：“内外之道，可合而明”。道安曰：“三教虽殊，劝善义一，教迹虽异，理会则同”。南朝的道士陶弘景礼佛读经（佛经），还“曾梦佛授

其菩提记云，名为胜力菩萨”。道家的葛洪也主张以道为本，以儒为末。慧琳主张“六度”（布施、忍辱、持戒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）与五教（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）并行，信顺（指道）与慈悲（指佛）齐立”。东晋的宗炳在《明佛论》中说：“孔、老、如来，虽三训殊途，而习善共辙也。”南北朝的名士也认为三教无根本冲突，认为三教是一致的。南齐名士张融希望他死后，手持《孝经》、《老子》、《法华经》，以表示对三教的尊崇。南朝的周禺著的《门论》中说：“道也与佛逗极无二”，“致本则同”，“达迹成异”。李师政的《内德论》也说：“夫释老之为教，体一而不二矣，同躅有欲之累，俱显无为之宗”。北周的沈重讲三教经义，朝士儒生、和尚、道士同坐一堂听讲，而且规模不小。三教哲理在中华大地上，经各自的情感折磨而走向理性的宽容。到南北朝时，同时兼修并习二教或三教学理，实际上并没有特别严格的教门限制，这一时期的三教殊途同归论，已透过三教表面的差异，把教人为善的共性理料出来了，这是很有远见的。这既表明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，也展示了华夏文化的囊括精神。

隋唐时期，三教的冲突趋于缓和，三教融合的风气更为盛行，尤其唐代三教共举和鼓励的政策，使三教融合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唐太宗不但进一步神化孔子，而且崇道奖佛，封孔子为先圣，诏令各州县建立孔子庙。表明唐太宗所推崇的“惟在尧舜之道，周孔之教”。与此同时唐太宗褒奖佛事，大力支持和厚爱隆礼玄奘；敬重道教，抬高李姓老子。武则天执政时三教合流更为显化，她令人撰写《三教珠英》，三教共聚一堂之风更为普遍。三教代表人物常常同殿宣讲各自经典，论说三教之哲理，求同为主流，融合风尚畅行。更为可贵的是唐朝政府明令禁止教派之间互相攻讦，不准相互攻击。华严五祖宗密说：“孔、老、释迦皆是至圣，随时应物，设教殊途，内外相资，共利群庶。”“惩恶劝善，同归于治”。名僧清著的《北山录》中说：“释宗以因果，老

氏以虚无，仲尼以礼乐，沿浅以洎深，藉微而知著，各适当时之器，相资为美”。白居易是儒生，既信道又信佛。刘禹锡认为儒、佛“犹水火异气，同味也同德；轮辕异象，致远也同功。然则儒以中道御群生，罕言性命，故世衰而寢息；佛以大悲救诸苦，广启因业，故劫浊而益尊。”他认为儒家“罕言性命”，适合于治世。佛家讲心性，大悲救苦，适合于乱世。柳宗元讲无神论，却信佛，他说：“浮屠诚有不可斥者，往往与《易》、《论语》合。……吾之所以取者，与《易》、《论语》合，虽圣人复生，不可得而斥也。”他们都认为儒、释虽用名词不同，哲理大道相通，其功用一致，具有殊途同归之效。唐末五代更主张三教融合，融合不只在理论上，民间造像的艺术表示也是三教共存。四川大足石刻造像中，三教的像同刻在一个洞窟的石壁上。值得一提的是少林寺的《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》上，有一幅三教圣人同头一身的石刻图像，整幅图看上去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正面像，以鼻梁为中线，左右两半显出的是孔子和老子的侧面像，在一幅图像中，融三教圣人为一体，形成同首同身的圆满之像，实为匠心妙意而刻划的三教大融合之写照。碑上还有唐肃宗皇帝李亨写的题赞：“佛教见性，道教保命，儒教明伦，纲常是正，百家一理，万法一门。”这些都说明这一时期三教文化的合一的趋势。

宋代三教合一之潮更为深入，三教在理论上进行融合，三家都互相向对方靠拢，互相渗透，互相融化。北宋的道士陈抟是由儒入道，精通佛理，他的《无极图》和内丹理论，就是三教文化融合的产物。陈抟用儒学《周易》的宇宙生成观，以传统道家学说为核心，又吸收了佛教禅定的学说，融合成具有三教特色的内丹理论。他的“五空学说”明显地是融合三教学说而创立的新理论。北宋道教内丹南宗开山鼻祖张伯端，一生博览儒、释、道三家之学，倡导三教合一之说。他说：“释氏以空寂为宗，……老氏以炼养为真，……周易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辞，鲁论有毋意、

必、固、我之说，此又仲尼极臻乎性命之奥也。……至于庄子推穷物累，逍遥其性，孟子善养浩然之气，皆切几言之。……教虽分三，道乃归一。奈何后世黄缙之流，各自专门，互相非是，致使三家宗要，迷没邪歧，不能混一而同归矣！”据说张伯端趺坐而逝的，烧化其尸，得舍利千百，用佛教的“涅槃”方法去求证他三教融合的内丹修炼，可见三教融合的理论 and 实践已非常深入。在宋代，公开提倡三教融合学说理论的要算道教了，道教常用“三教原来是一家”的口号，来促进三教文化的全面融合。

宋代三教融合的另一重要标志，是儒家吸收了佛道二家文化，创立了以儒为主，兼熔释、道文化于一炉的理学体系。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来自道家的传承，用易理和道家的术语来阐述宇宙生成的理论。周敦颐讲的“诚”、“主静”、“无欲”等人性之说和修心之说，是援佛道明心炼心之说而入儒理的。他的《爱莲说》也是受佛学影响的。二程受佛学的影响更为明显。程颐赞美佛学“极尽乎高深”，认为佛学比庄周思想更为精深。二程的“静坐”、“用敬”、“致知”等治学方法，与佛学禅定、智慧之说不无关系。宋代理学最大的代表人物朱熹对佛道二家的经典均有精心研究，尤为推崇佛教，程朱理学的“天理”、“天命之性”、“尽性知天”、“理一分殊”的认识和佛学的佛性、自性等理论很相近。理学家除周程朱外，后来的陆王心学更是融合佛家之说。文化融合在宋、明理学得到了深层次的发展。但由于文化的传承，学派门户之见和情感的作怪，儒、释、道文化的融合过程是极其艰难的。由于思想根源和历史条件的限制，三教文化的大融合不得不在隐秘和巧妙的安排上多费心思，甚至在非难排斥对方的手法中取其所长，宋、明理学确实是这样，这是历史造成的必然。后儒学人，有褒有贬，但理学的“儒表佛里”、“阳儒阴释”的文化大融化的历史功绩，将愈来愈受人们的理解和肯定。从整个人类文明来看，从整个人类文化的整体来看，文

化的相互大融合，这将是历代学者们的历史任务和其功绩。

这一时期，佛学也在援儒入佛，宋代的名僧契嵩认为“夫孝也者，大戒之所先也”，“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”“圣人之善，以孝为端。”“律制佛子，必减其衣盂之资，以养父母。”“儒以孝为百行之首，佛以孝为至道之宗。”他认为，佛之五戒与儒之五常可以合而用于教化人心，“五戒，……夫不杀，仁也；不盗，义也；不邪淫，礼也；不饮酒，智也；不妄语，信也。”“儒佛者，圣人之教也，其所出虽不同，而同归乎治。”

金、元时期，三教文化的融合，从理论上的融化，到实践上的操作，直到公开创立三教合一的全真道出现，使历史上的三教文化，从融合、融化到合一，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。这一起点的代表人物就是全真道的创始人——王重阳。王重阳说：“儒门释户道相通，三教从来一祖风”。王重阳公开以三教合一为旗帜，自称其教为“三教合一会”。全真道把三教合一作为入道修炼的基本原则，在三教文化的大融合中实属首创（王重阳和全真道关于三教合一之说，见下一章）。从此中国历史上三教文化的融合由隐秘转向公开，由不自然到自然而然。从此以后，儒、释、道三家再也不用遮掩闪烁之词，也再不采用非难和援取并用的手法。

僧人孤山智圆自号“中庸子”，称他的思想是“宗儒为本，儒佛共为表里”，“释、道、儒宗，其旨本融，守株则塞，忘筌乃通。”

明、清两代，理学受到官方尊崇，佛道相应衰微，但三教合一的风气大倡。清朝陆世仪就说过：“隆、万之时，天下几无日不讲学，无人不讲学，‘三教合一’之说，倡言无忌，而脉学之淆乱，于斯为极。”可见三教合一之风朝野盛行。道家的张三丰曰：“儒也者，行道济时者也；佛也者，悟道觉世者也；仙也者，藏道度人者也，各讲各的妙处，各讲各的好处，何必口舌是非哉？……只要行阴德，仁慈悲悯，忠孝信诚，全于人道，仙道自然不远也。”明代理学大家王阳明对佛道很有研究，他说：“仙家

说到虚，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；佛氏说到无，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。”僧人元贤说：“则非独三教是一，即一切魔外以及资生业等，皆顺正法，盖理外无教，故理必归教。”明代佛教四大家（株宏、真可、德清、智旭）均主张三教合一为一家。株宏（号莲池）被誉为“法门之周孔”。真可称儒家五常为“五如来”。德清（号憨山）认为“不知《春秋》，不能涉世，不精老庄不能忘世，不参禅不能出世。”智旭认为佛、儒哲理相辅相成，“惟学佛然后知儒，亦惟真儒乃能学佛。”

明、清两代虽然佛道衰微，但历代三教融合的思潮有增无减，其特点不是体现在正统的或官方的三教代表人物方面，却是渗透到民间信仰中。明、清两代民间秘密宗教极为活跃，民间宗教都是主张三教合一的，可以说都是三教合一的产物。这表明三教合流、三教融合、三教合一成为历史的趋势和潮流，也是一千多年三教文化从接触到揉合的必然结果。从明朝中叶开始，正统的三教不同程度日趋衰微，道教为甚，佛教次之，理学虽得到重视，但在文化上缺乏活力。三教合一之风日益流于民间，尤以罗梦鸿创罗教为标志，三教合一的思想从上层逐渐转入下层，民间宗教的影响日益增大。事实上民间宗教三教合一的出现，是三教文化在一千多年间相互融化的一种成熟的表现。因为明清两代民间宗教的最大共同点是三教合一。民间宗教的经卷几乎都是三教合一的内容。民间宗教将三教合一的学说理论通俗化和普及化，把三教文化深奥的哲理口头化、浅显化，将三教文化绕口难懂的语言，变成群众易于理解和背诵的口头语言。但有些三教哲理受到歪曲，并加杂了迷信地诬说邪见，以及随心所欲的编造，甚至杜撰形成混乱和荒诞。

任何一门宗教的理论，都是由一种学说、哲理演化而来的。一千多年的儒、释、道合一之趋势，使三教文化不断发展和深化，不断地认识和接受。从撞击冲突到融合融化，再发展到汇成

三教合一的大潮流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基本过程。这种三教合一的大潮流盛行数百年后，这个影响从近代、当代的各界人士身上都可看到。如近代的魏源、龚自珍、梁启超、章太炎都相信佛教，精研道教，著作论说，三教并举。魏源晚年干脆当了居士。梁启超也精研佛教，说：“佛教是智信，不是迷信”。晚清著名道士刘一明的论著中，三教之理融会贯通，是道教人士中受三教合一潮流影响的典型代表。他曰：“金丹有象，在儒则谓明善复初；在释则为摩诃般若波罗蜜，以大智慧登彼岸，亦明善复初，還元返本之意。三教圣人，皆不外此逆运妙理。”他在论及结圣胎之名时说：“道曰金丹，儒曰太极，释曰圆觉”。他在论中图中讲：“儒曰执中，道曰守中，释曰虚中，中之一字乃三教圣人心法”。

近代的佛学大师（如印光、弘一、虚云等）在讲解佛教经典时，经常援引儒、道学说为之解释。实际上不独三教人士具有三教合一思想，世人的生活、言谈举止中都渗透着三教合一的气息。三教合一思潮波及朝鲜、日本、东南亚各国，同样影响极深。日本的诸桥辙次著了一本《三圣会谈》，风趣地将三教圣人“请”在了庐山的五老峰，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“三圣会谈”。这个小册子也算是一千多年来三教从斗争、融合、到合一在人们观念上的认可。人们拟构出三圣同席会谈，也算是时代要求三教合一的愿望。事实上自明代中叶后，三教圣人同绘或同塑于同一寺、同一观、同一庙、同一殿的事实比比皆是，只要你留心，至今到处还可见其迹。

二、王重阳全真道的三教合一思想和其影响

王重阳，原名中孚，字允卿，后改名世雄，字成德。后又改名哲，字知明，号重阳子。祖籍陕西咸阳人，后迁居于终南县的刘蒋村。1112年农历3月出生於终南县刘蒋村。王重阳自幼思想

开放,不拘小节,才思敏捷,文武皆习,由于王重阳磊落不羁,关中人称他为“王害风”。据说在陕西户县甘河镇遇高人点化、悟道出家。1166年,王重阳55岁,他去山东,建立了全真道。有马丹阳、孙不二、谭处端、郝大通、丘处机、王处一、刘处玄为其大弟子,后称为七真。王重阳的全真道,公开打出三教合一的旗帜,建了一批以三教合一为特征的教团,如:“三教七宝会”、“三教金莲会”、“三教三光会”、“三教玉华会”、“三教平等会”等,这些教团都公开以三教合一为内容,这是千百年来儒、释、道文化大融合的教派形式的体现。王重阳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以三教合一为宗旨的全真道,这不能不说是王重阳的胆识和远见。

全真道把三教经典共同传习和诵念,把三教的修持方法融会贯通而应用。元好问在《紫微观记》中曰:“贞元正隆以来,又有全真家之教,咸阳人王中孚倡之,谭、马、丘、刘诸人和之,本于清净之说,而无黄冠襦袂之妄;参与禅定之习,而无头陀缚律之苦。”王重阳大倡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,摒弃符录、咒术,参以佛、儒之理论,建立清净素朴、修心炼性的内丹学派。全真道的内丹派的确是禅学和理学相结合的产物,王重阳采用三家理论之共同,用三家修持之长,形成了独特的全真派的修持方法。三教同源一致的论调,是王重阳和全真道理论的基础,也是王重阳思想的根本点。王重阳和他的七真弟子倡导三教合一的教派学说之后,三教合一一直是全真道的旗帜。《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》称:“三教者如鼎三足,身同归一,无一无二,三教皆不离真道也,喻曰:似一根树生三枝也。”王重阳创教之时,“凡立会必以三教名之”,“不主一相,不拘一教”。他说:“释门儒户道相通,三教从来一祖风”,“心中端坐莫生邪,三教搜来作一家”。在王重阳所创立全真道之初,王重阳并没有把全真道看成是道教的传承派别,而是以儒、释、道三教的继承人自居。的确王重阳的全真道是千百年来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的体现。三教文化从不同的

地域创立，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历程，至王重阳全真道的创立，从理论上、组织形成上、以及修炼操作上都体现了三教文化的内在特点，把三教文化根本的相同点提炼凝聚成为一颗圆融的硕果，从世界文化处于大融合的今天来看，这是王重阳的历史功绩。诚然首创三教合一的教团，受到各方面习惯思维和习惯势力的反对，但这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，任何一种新生事物都有同样的遭遇。耶律楚材在《西游录序》中就斥全真道为老氏之邪，主要仍以不“纯正”而责难之。这也正好说明王重阳三教合一思想的特点，人们以“非儒非释，漫以道教目之”。因为王重阳继承了道教内丹修炼的理论和实践。但有识之士对王重阳创立全真道予以很高的评价：“洗百家之流弊，绍千载之绝学。”王重阳确实是继承了老子《道德经》的宗旨，注重炼心见性的内修绝学（指《道德经》），洗去药食、虚玄、房术、符录、禳桮的流弊。王重阳的全真道绍绝学，洗流弊，建立了明心见性，先性后命的内丹修炼学说，熔禅学、理学与道学于一炉。

王重阳和他的七大弟子多是出身豪门富户的知识分子，弟子们在异常朴素艰苦的生活中修炼，而且各有成就，不能不说是王重阳思想具有优越内涵的结果。元好问在《紫虚大师于公墓碑》中记载：“全真道有取于佛老之问，故其憔悴寒饿，痛自黥劓，若枯寂头陀然；及其有得也，树林水鸟，竹木瓦石之所触感，则能事颖脱，戒律自解，心光烨然，普照六合，亦与头陀得道者无异。”袁楠在《野月观记》中曰：“北祖全真，其学首以耐劳苦力耕作，故凡居处服食，非其所自为不敢享，蓬垢疏粝，绝忧患慕美，人所不堪者能安之；调伏摄持，将以复其性，死生寿夭，泊然无系念。”王重阳的全真道，以修心炼性为务，行常人所不能行，忍常人所不能忍，做为王重阳思想的养炼方法和实践，可见其根底之深，不能不令后人钦佩。

马丹阳，家资巨万，本属豪门，自从皈依王重阳后，潜心修

行，励行苦节，每日仅食一钵面，四季赤脚，夏不饮水，冬不向火。“启迪全真，发挥玄教”，是“七朵金莲最先放彻”者。

谭处端，为人非常孝顺，博学多才，擅长书法，皈依王重阳后，刻苦修心炼性，“灭人我，绝思虑”，“抵千金而不顾，挂百衲以甘贫”。乞讨残食，遭人殴打，击断两颗牙齿，他将断牙和血咽入腹中，路人见之不平，谭处端却“笑而稽首，殊不动心，由是名满京洛”。他开创了全真道南无派。

刘处玄，世代官宦大家，以孝闻乡里，皈依王重阳后，“乞食炼形”，“炼性于尘埃之中”，“管弦不足以滑其和，花柳不足以挠其精，……定力圆满，天光发明。”他开创了全真道随山派。

王处一，七真之中，修真最苦，“偏翹一足，独立者九年。东临大海，未尝昏睡。”“九夏迎阳立，三冬抱雪眠。”“异迹惊人，”教化者众。创有全真道嵒山派。

郝大通，自幼精通易理，皈依王重阳后，以苦行感人，据说坐一桥下，头顶砖块，默然不语，“虽有人侮狎戏笑者，不怒也，志在忘形”。如是六年不语，人称“不语先生”。创有全真道华山派。

孙不二，马丹阳之妻，马丹阳随王重阳入道后，不久亦决心修炼，“炼心环堵，七年之后，三田返复，百窍周流。遂起东行，游历洛阳，劝化接引，度人甚多。”创有全真道清静派。

丘处机，世为望族名姓，是全真道最杰出的传道者，王重阳创立全真道，有赖丘处机大宣于世。他潜心苦修，“乞食于潘溪太公垂钓之所，战睡魔，除杂念，前后七载，胁不占席，一蓑一笠，虽寒暑不变也。人呼为蓑衣先生。”他继承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思想，认为“儒、释、道源三教祖，由来千圣古今同”。丘处机曾行程万里，去应成吉思汗之请，“不辞暴露于风霜，自愿跋涉于沙渍。”进见成吉思汗，规劝敬天爱民，少杀戮，救度苍生无数。《元史》记载：“太祖时方西征，日事攻战。处机每言一天下者，必在乎不嗜杀人。及问为治之方，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。

问长生久视之道，则告之清心寡欲为要。太祖深契其言，命左右书之，且以训诸子焉。”《金莲正宗记》亦载之，“受皇帝之宣，应阴山之聘，劝之以减酒色，戒之以少杀戮，一言恺切，万国生春，救亿兆于鼎镬刀锯之间，人心归向者如百川赴海而莫之能御也。”丘处机劝阻元代统治者的野蛮屠杀，其功昭彰，连清朝乾隆皇帝也赠词曰：“一言止杀，始知济世有奇功。”丘处机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思想传播到朝野，使全真道的发展达到了鼎盛。他开创了全真道龙门派，该派对后世道教影响很大，其后全真道多出龙门派。

王重阳的三教合一思想对后世的道教影响极大，好多著名的道教人士，大多继承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主张，并都极力论证儒、释、道三教的同源一致性。

元初江南全真道的代表人物李道纯，继承王重阳的三教合一思想，认为“儒释道三教，名殊理不殊”。他论证三教，虽名词各异，意旨同一。他认为“太极”、“圆觉”、“金丹”都是一回事。“释曰圆觉，道曰金丹，儒曰太极。所谓无极而太极者，不可极而极之谓也。释氏云：‘如如不动，了了常知。’《易系》云：‘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。’丹书云：‘身心不动以后，复有无极真机。’言太极之妙本也。是三教所尚者，静定也，周子所谓主于静者是也。”这是李道纯从本体状态上体悟三教同源，是对王重阳三教合一学说的发展和深化。他还以○的图相来表示三教同源。他说：“释氏曰○，此者真如也；儒家曰○，此者太极也；吾道曰○，此者乃金丹也。”“金者坚也，丹者元也。释氏喻之为圆觉，儒家喻之为太极，太极初非别物，只是本来一灵而已。本来真性永劫不坏，如金之坚，如丹之圆，愈炼愈明。”李道纯的“守中致和”也是对王重阳三教合一思想的充实。他认为：“未发谓静定中谨所存也，故曰中；存而无体，故谓天下之大本；发而中节，谓动时谨其所发也，古曰和；发无不中，故谓天下之达道。